

March 2017

A Study of Liu Yongji's Litterateur Temperamen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Separation and Reunion of *Xueheng* and *Xiangjun*

Wenxin Chen

Junwei Ji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Chen, Wenxin, and Junwei Jiang. 2017. "A Study of Liu Yongji's Litterateur Temperamen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Separation and Reunion of *Xueheng* and *Xiangju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7, (2): pp.58-68.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7/iss2/3>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从《湘君》与《学衡》的离合看刘永济的辞章家风范

陈文新 江俊伟

摘要: 本文以 20 世纪 20 年代的刘永济为中心,以“学衡”这一宽泛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为参照,以《湘君》与《学衡》的离合为焦点,旨在揭示刘永济的辞章家风范。刘永济之于《学衡》,始终扮演支持者、追随者的角色;而在《湘君》的话语空间中,他则有着更为自主的文化姿态。《湘君》与《学衡》一重创作、一重学术的差异,刘永济等的清高自持与吴宓等的斗士风范的差异,有助于我们亲切把握刘永济作为辞章家的气质。

关键词: 刘永济; 学衡; 湘君; 辞章家

作者简介: 陈文新,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小说史、明代诗学和科举文化。电子邮箱: 00001187@whu.edu.cn 江俊伟,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讲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和科举文化研究,电子邮箱: wuhanjjw@163.com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刘永济评传”[项目编号: 16FZW037]阶段性成果。

Title: A Study of Liu Yongji's Litterateur Temperamen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Separation and Reunion of *Xueheng* and *Xiangjun*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Liu Yongji's litterateur temperament by analyzing the separation and reunion of *Xueheng* and *Xiangjun*, and by focusing on Liu Yongji's activities in the 1920s with reference to an inclusive definition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f *Xueheng*. In terms of *Xueheng*, Liu Yongji's role was always a supporter and a follower. In contrast, he adopted a more independent cultural attitude in terms of his discourse for *Xiangjun*. Unlike *Xiangjun*, which paid more attention to literature, *Xueheng* valorized academic research. Unlike Liu Yongji's high-hearted pride, Wu Mi's style was much more like one of a fighter. These differences reveal Liu Yongji's litterateur temperament.

Keywords: Liu Yongji; *Xueheng*; *Xiangjun*; litterateur

Author: Chen Wenxin is a doctoral tutor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n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Yangtze River Scholar, with research focu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the poetic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cultur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Email: 00001187@whu.edu.cn

Jiang Junwei is a lecturer of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focus on literatur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cultur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Email: wuhanjjw@163.com

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大陆,《学衡》曾经被人遗忘,或者说,曾经被有选择地加以叙述。这种遗忘或选择性叙述,既是现实政治、文化环境的“话不投机”使然,也与昔日《学衡》主将们刻意或被迫保持缄默不无关联。在《学衡》停刊 33 年后的 1966 年,吴宓拒绝了将《学衡》创办经过付诸文字的邀请。他的理由是:“《学衡》社的是非功

过,澄清之日不在现今,而在四五十年后。现在写,时间太早”(华麓农 58)。吴宓的抉择,在当时的舆论气候下无疑是明智的。一本曾被鲁迅讥讽为“不值一衡”的刊物与它所承载的文化保守主义理想,确实不宜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大陆公开宣扬。而吴宓对未来的极其准确的预见,虽然可以理解为真理在握的自信与自负,但更有

可能只是聊以自慰,甚至只是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样一句老套格言的习惯性重复。

幸运的是,历史竟然没有辜负吴宓的期待。“因其思想近于保守、论点过于理想化而一直处于被贬低、嘲讽的境地中”(“学衡派评介”1)的《学衡》,随着国学热的升温,又回到了当代学人的视野。这个时候,亲历过那些纷争的当事人、支持者乃至反对者大多早已故去。对于《学衡》的讨论,也渐渐褪去了意气之争与意识形态的阴影,与之相关的学术成果层出不穷。正是有了这些成果的支持,我们得以初步还原刘永济所真切依存过的这个文化平台。

为了讲述刘永济与《学衡》的关系,我们的视线还将转至一本不甚为人所知的刊物——《湘君》季刊。这本如今只存留下三期的刊物,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坐标。与在《学衡》中的普通作者身份不同,作为湘君社长的刘永济,只要他愿意,他就有能力影响甚至左右《湘君》的旨趣与风格。关于《湘君》与《学衡》的对照,可以帮助我们刘永济的辞章家风范做出更为亲切的描述。

一、刘永济何以与《学衡》结缘

将《学衡》与学衡派置于同一语域,以此来考察刘永济的早期学术活动及其学缘结构,也就有了对刘永济的“派别”归属加以界定的必要。《刘永济先生年谱》曾断言刘永济“非《学衡》社员”,^①也许是担心刘永济受到《学衡》的连累,而我们则想提及这样一个信息,以明确《学衡》之于刘永济的意义。那是在1940年,也就是《学衡》停刊的七年以后,刘永济将一首《鹧鸪天》词赠给了吴宓与梅光迪,其词序云:“偶检论文旧稿,有感于伪江南近事,赋寄学衡社友迪生、雨僧两兄”(“鹧鸪天”56)。“社友”是同社中人的彼此互称,刘永济既然以“社友”来称呼梅光迪与吴宓,他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其实已无丝毫含混之处。而与刘永济过从甚密的程千帆也明确说过:“刘永济先生就是学衡派”(《桑榆忆往》20)。这则材料同时也提请细心的读者注意:《学衡》杂志也好,学衡派也罢,它们对于刘永济的意义,首先是与之关联的那些“人”,以及由此产生的学缘关系及其文化学术走向。

在刘永济的学术生涯中,《学衡》是一个有着

特殊意义的平台:他正式迈入学术圈子,正是始于为《学衡》杂志撰稿。一方面,与吴芳吉等人一样,刘永济是作为吴宓、梅光迪“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回眸‘学衡派’”24)加盟《学衡》的;另一方面,与好友陈寅恪相似,刘永济也符合“情趣相投的撰稿人”这一标准,是因“学术思想、文化观念与《学衡》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趋同,赞成《学衡》的宗旨和主张”(“回眸‘学衡派’”44)而结缘的那一批作者。

刘永济与《学衡》结缘,除了“情趣相投”“志同道合”外,其更为直接的原因在于,吴宓常以清华同窗兼挚友的身份“逼”他撰稿。1923年4月6日,吴宓在写给吴芳吉的信中说:“即宓意我辈志业高远,而大病在不能结团体,夫《学衡》既有中华书局之印售,又有宓之经营琐务,专待同志之作文寄稿而已。虽其初发起之时,由于此间诸人,然其后诸人不尽力作文,大权尽在宓手,故《学衡》者,亦即弟与宏度、柏荣兄之《学衡》也”(《吴宓书信集》90—91)。当吴宓将《学衡》视为他与吴芳吉、刘永济、刘朴等人所共有的文化园地和学术平台时,在征稿、索稿时也就从不客套,而是极其个人化和情绪化。^②1924年11月25日,他写信向刘永济与吴芳吉催稿,那种近乎逼债的口气,令人忍俊不禁:“《学衡》乏稿,正值交涉续办,故尤须内容丰富,著译精粹,方足见重于人,故望二公速尽力撰著,并力促柏荣、绍周、友古、复庵诸兄速一同撰著,赶紧寄下,如围城望救兵也。望二公速代函以上诸兄,催促之”(《吴宓书信集》98)。有时,吴宓催稿之促、情急之笃,几乎到了“以死相逼”的地步。1925年,他在寄给刘永济、吴芳吉、刘朴三人“同阅”的一张催稿明信片上竟这样写道:“《学衡》续办,稿件缺乏[……]望宏度兄速撰长篇寄下[……]总之,勿认《学衡》为宓一人之事,《学衡》停版,宓即投身窗外水池中耳。望速寄文章来,余另详。托钞曾重伯、王先谦等件,何亦竟无成功,望三公日日在意,当思《学衡》每月需67000之稿。至于宓之生死苦乐,可以不问,宓生不能感动朋友,维持一小小杂志,何颜苟活哉!”(《吴宓书信集》102)。这种“以死相逼”的催稿法,即使是个性率真的吴宓,想来除了极亲近的挚友之外,也是不会经常采用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这种笃厚的私谊,正是刘永济与《学衡》结缘的最为切近的因素。《学衡》对于他来说,不只

是一个阐说“迂阔之言”的同仁媒体,一个发表诗词的风雅刊物,更是与吴宓、梅光迪等人私谊的沟通渠道,是分担友人吴宓“生死苦乐”的一个空间。

《学衡》与学衡派,是一对密不可分的学术史存在:一个是被视为与《新青年》大唱对台戏的文化保守主义刊物,一个是被视为“堂吉珂德式”的学术群体。与普通学术刊物有所不同的是,《学衡》既是学术交流的园地,更是文化交锋的阵地。毕竟,《学衡》之诞生,乃缘于梅光迪、吴宓等人犹如“楚囚对泣,惨然无欢”(“吴宓日记”154)的忧虑,兴于欲“与若辈鏖战一番”(“吴宓日记”144)的斗志。在这种充满了悲剧感和使命感的氛围之下创办的《学衡》杂志,其文化锋芒之尖锐,未免使其学术园地的性质相对黯淡。置身于《学衡》场域中的刘永济,他在《学衡》上发表了多篇与新文化运动立异的文章,如:

古之人抱悲天悯人之情,怀匡民济世之志,既不得通达于当时,乃著之空言,传之后世,其亦良可哀矣。而后之人诵其诗,读其书,能因以见其志,感其情者,亘百世而不易一遇。其有不变乱黑白,狡狴假借以售其私者,必支离破碎,武断曲解以失其实。是其情志所蕴积,将终无表曝之日,又遑论本其情,述其志,而为之发扬光大之乎!至于妄肆讥评,以抨击古人为名高,俨然若法官坐堂皇,跪古人于阶下而裁判之,若者徒,若者杖,若者罚鍰,更无论矣。呜呼!古之人即至不幸,亦何至若此。是岂讲学者所当为耶? (“文鉴篇”434)

刘永济当然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这一点不需多说。有意味的是他的论争方式。刘永济并没有采取声色俱厉的叫战口吻,而是揆情度理,向读者显示了古代圣贤在漫漫的历史长途中所遭遇的几乎看不到终点的困境。古代圣贤满怀悲天悯人之情,匡民济世之志,却无缘在现实生活中施展其抱负,只能托之空言,期待在后世遇到知音。这已经足以令人唏嘘不已了,可是后世的状况也同样甚至更加令人不胜唏嘘。那些掌握了国家权力包括文化权力的人,不是误解圣贤著作的真实内

涵,就是假借圣贤的名义夹带一己私货,要出现一个真能将圣贤理念发扬光大的人,真是百世而不可一遇。眼下的状况更是空前的不幸,居然有人把圣贤视为罪犯,一一加以审判,让他们为权势者承担祸国殃民的罪责。“呜呼!古之人即至不幸,亦何至若此。是岂讲学者所当为耶?”在刘永济的感慨中,不难读出这样的意思:国家之所以混乱至此,正是由于圣贤理念未能付诸实施的结果,罪责在历朝历代的权势者;现在反倒要圣贤为权势者承担罪过,这在情理上说得过去吗?刘永济这种行文方式,显示了他作为辞章家的气质,虽然也晓之以理,但更多动之以情。

对刘永济来说,如果滤去了参与文化论争的意义,《学衡》对其学术影响的扩大、学术地位的确立也是有显著作用的。例如,刘永济与张舜徽的交游,就起因于“舜徽先生年少时,即闻刘氏大名,‘常于《学衡》杂志上读其所为文,心焉仪之’。后来卜居武昌,任华中师院历史系教授。华师在桂子山上,与武大所处之珞珈山相去咫尺,故舜徽先生与永济先生得以时时往还,过从甚密[……]相与议论切磋,气味相依,惺惺相惜”(李绍平161)。正是凭着《学衡》这个平台,刘永济的学术声誉,从湖湘之地逐渐扩散至全国范围。

二、《湘君》与《学衡》确曾相互呼应

1922年6月,刘永济、吴芳吉、刘朴、谢祖尧等在明德学校成立了湘君社,刘永济被公推为社长。湘君社的社刊名为《湘君》,由吴芳吉主持。

湘君社命脉所系在于《湘君》,但《湘君》延续的时间并不长。1922年6月创刊,出第一期,1923年3月出第二期,1924年5月出第三期,此后即无疾而终。《湘君》停刊的原因,主要是销路不好,缺乏后续经费的支撑。而销路不好的原因,一是明德学校地处长沙这一偏远地带,辐射范围有限,二是《湘君》以“文艺趣味”为主,缺少社会舆论所关注的热点话题,这两者都限制了《湘君》的社会影响力。

在大多数与《学衡》相关的研究成果中,《湘君》季刊的存在,要么是微不足道的小话题,要么便索性忽略不计。偶有提及,也多半是将之视为一个依附于《学衡》杂志或学衡派的存在。例如,沈卫威就将《湘君》《史地学报》《国学丛刊》《国

风》等一律视为《学衡》的同人刊物,纳入“新旧文化之争”的格局加以论述。他说:“反抗新文化—新文学的话语霸权,以文化保守的姿态抗衡文化激进,强调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弘扬人文主义精神,是《学衡》杂志的特征(包括《湘君》)”(“学衡派‘谱系’”43)。上述判断不无依据,《湘君》的首倡者吴芳吉便从不讳言二者之间的呼应关系:“长兄在南京创《学衡》杂志,某因创《湘君》应之”(《吴芳吉集》545),这里的“长兄”,指的就是吴宓。

所谓“同人”,指《湘君》的主要创办人、撰稿人甚至主要阅读群落、影响范围,皆与《学衡》存在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湘君》的主要创办人,以长沙明德学校的教员为基本班底,其中刘永济、刘朴、吴芳吉等,皆是《学衡》的作者。刘朴曾说:“(吴宓)创《学衡》杂志。芳吉则创《湘君》,辟伪新文学,自为诗;推刘永济社长,为词;朴为散文。又皆执笔《学衡》”(《吴芳吉集》1365)。这种作者群的重合,使《湘君》与《学衡》几乎如同唇齿相依。

《湘君》第三期曾专门登载了《学衡》简介:

创始于民国十一年冬,每月一期,已出三十余期。

其宗旨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其态度在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其与时下杂志不同之处,在不尚标榜,不事鼓吹,不攻讦谩骂,不徒好新奇,不迎合社会心理,不作惊人可喜之论。

凡有志文哲艺术之士,欲不为时髦之言所愚,不为偏之见所蔽,不为主义一党派所拘束,不为一家之见解一国之文字言语所颠倒错乱者,请读《学衡》杂志,则黑暗之境,自有光明;烦闷之情,自能解慰;纷乱之象,自有条理;枯燥之思,自滋生趣。

盖其于安身立命之道,齐家治国之方,文化之真谛所存,汉族之精神所在,谆谆三致意云。

编辑处:南京鼓楼东保泰街十号《学衡》杂志社。定价每册二角五分,全

年二元五角,邮费全年三角。各省中华书局发售。(“学衡简介”)

这一具有广告性质的简介,是对《学衡》的直接支持。相应的,《湘君》的发行也得到了《学衡》同人投桃报李的帮助。从《湘君》的出版发行,到它的推广运作、影响扩散,乃至一些细微小事,吴宓均予以密切关注。吴宓曾在自编《年谱》中详细记载了《湘君》第三期的印刷情况。他说:吴芳吉的学生汪剑余将第三期《湘君》携至上海刊印,“乃投入私立南方大学校长江亢虎门下,竟将《湘君》第三期之封面(书册为横长形)印成一淡蓝色底、红字之横匾,‘湘君’两大字,其下‘第三期’,字极小,几不可见。左署‘江亢虎题’,不知江君与《湘君》有何关系?又曾为《湘君》出何力也?”(“吴宓自编年谱”248)。连《湘君》的封面设计等细节都在他留意的范围之内,可见其关注之切。

吴宓对《湘君》的扶持,尤其表现在亲力亲为的宣传与推销。1923年2月,吴宓收到刘永济、吴芳吉等人寄去的《湘君》第二期,当即“召集熟识之学生,在东南大学口字房一教室内,开一小会,讲述《湘君》之特别优点,并为推销”(“吴宓自编年谱”241—42)。除了向学生推销以外,吴宓还曾为《湘君》的代售事宜四处奔波。1922年10月20日,他在写给吴芳吉的信中说:乐天书局“又愿代售《湘君》,宓前已分散净尽,仅馀一册,自存,今已付该局作样本。见片后,乞即寄上五本或十本《湘君》来此,由宓经营代售,但愿以若干为该局报酬,乞自定示知。又该局云,如愿减价售出,例如九折,只售三角六分,则易售出云云,如何统乞决示”(《吴宓书信集》85)。而且,吴宓推广《湘君》并不限于熟识的学生圈子,也不只是向书局推荐代售。在1922年写给吴芳吉的另一封信中,吴宓曾提及他为《湘君》说项:“宓则正设法为《湘君》表扬,今均不述,如有所成,当以其成绩相告,以求省事”(《吴宓书信集》83)。正是在吴宓等人的支持下,《湘君》在南京的销路,较之其他地区明显胜出一筹:“总计暑假两月,《湘君》所卖出者,不及十分之二,乃又托人再向各埠兜售。在上海陈列百日,卖十三本;在四川重庆,半年卖去七本;惟在南京,得友人之游扬,竟于一月之间卖五十本,故《湘君》之销路,以南京为第一矣”(《刘永济先生年谱》272)。《湘君》在南京的行销状

况较好,主要得力于吴宓,他是把《湘君》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做的。

现存的吴宓写给刘永济与吴芳吉二人的信函中,有这样一封:

正月十三日庄士敦先生来函,节录如下: I have shown the 湘君季刊, which you kindly sent me, to the Peking members of the Burns Society (or rather the St. Andrews Society) which annually celebrates the birthday of the Scottish poet, and they are delighted to know that some of his poetry has been considered worthy of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今索《湘君》之裨君,当为求阅 Burns 之诗之故。尊处如能觅得《湘君》第一期一册寄与之,则幸甚。宓之复函,已以《湘君》之详情告之矣。(《吴宓书信集》89)

收到过吴宓寄赠《湘君》的文化名流,想来不只庄士敦一人。1925年,吴宓又曾“以《湘君》二期,赠大连诸中日诗人文人凡数册”(《吴宓书信集》98)。与《湘君》同人的私谊与共同的志趣,决定了吴宓对《湘君》有着切己的关切。这种切己的关切,即使是在《湘君》停刊若干年之后的1962年,仍在影响着吴宓的生活。吴宓在这一年所写的日记中,还保留着“归读《湘君》季刊”(“吴宓日记续编”354)的记载。残缺的史料与时光的阻隔,已使我们难以体察四十年后吴宓重读《湘君》的起因与用意。但却不难推想:当吴宓的目光抚过那些熟悉的名字、熟悉的文字时,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故友亲切而鲜活的形象,心底也一定会闪过一瞬悸动。历史,总是活在具体的细节中。

《湘君》与《学衡》所刊载的文章、诗词,存在相当程度的“互见”现象。在稿源奇缺的境况下,《学衡》有时甚至会“预录”《湘君》即将刊发的内容。这类“互见”的篇目,除了刘永济等人的诗词类文学作品以外,最受瞩目的就是那些口径相同、步调一致地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文。如,吴芳吉的《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前三论分别刊于《湘君》第一、二、三期),均为《学衡》所转载,其

《四论》因《湘君》停刊而首发于1925年6月《学衡》第42期。至于刘永济在《湘君》上所发表的文章,其互见于《学衡》者,除了《迂阔之言》这样被明确贴上反对新文学标签的篇目外,诸如《论文学中相反相成之义》等文,也卷入了《学衡》诸公关于“新旧”的讨论。这些为《学衡》所转载或“预录”的《湘君》诸文,当然是一致“反对新文学”的。

对于这种作品“互见”的现象,《湘君》的主事者并不讳言,也相应地作出过解释。《湘君》第三期所刊出的《上期报告》中写道:“《湘君》之稿有互见于《学衡》者,《学衡》《湘君》同声气也”(171)。“出杂志以矫正伪新派文学之失”(《吴芳吉集》264),是《学衡》与《湘君》声应气求的共同立场。

对于这种作品互见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同声气”意旨,吴宓是颇为满意的,并极其热心地将这一事实昭告于世人。他在《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一文中说,“近年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本其偏激之主张,佐以宣传之良法[……]加之喜新盲从者之多”,而《湘君》这样的“于新文化运动怀疑而批评之书报”,则是“新文化运动之反应”(4)。这样的介绍引起了鲁迅的警觉,他引了吴宓关于“《湘君》求文艺之美”“故兼用通妥白话及新式标点”(4)的说法,调侃道:“总而言之,主张偏激,连标点也就偏激,那白话自然更不‘通妥’了。即如我的白话,离通妥就很远;而我的标点则是‘英文标点’”(393)。与《学衡》同声气的《湘君》,也与《学衡》一样承受着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不屑与不满。

三、《湘君》与《学衡》的文化姿态确有差异

《湘君》与《学衡》之间的“同声气”,甚至使吴宓一度生出了这样的期望:“倘能合《湘君》《学衡》之人才为一,去每种之魔障,存二者之精华,由我等同心人主持之,则必有奇光异彩,而远胜于今日之情形”(《吴宓书信集》82)。令他失望的是,这一愿望“事实上竟不能为也”(《吴宓书信集》82)。毕竟,不论彼此之间有着多么亲近而密切的关系,《湘君》与《学衡》终究是两份各自独立的刊物。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从表象上看至少体现在一重创作与一重学术等层面;究其实

质而言,则是在文化姿态上的差异。较之存心“救世”的《学衡》而言,《湘君》更多清高“自愉”的意味。《学衡》“狂”而《湘君》“狷”,了解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湘君》的题旨、内容及风格,也有助于我们更为亲切地把握刘永济的辞章家气质。

对于《湘君》与《学衡》的差异,两社“同人”有着清醒的意识。吴宓曾一言以蔽之,曰《湘君》“注重文学创造”(“吴宓自编年谱”236)。而吴芳吉在其《自定年表》中则将这种差异表述为:“两者精神虽同,旨趣各异。《湘君》注重创作,《学衡》多事批评;《湘君》但载词章,《学衡》更及义理;《湘君》之气象活泼,《学衡》之态度谨严;《湘君》之性近于浪漫,《学衡》中人恪守典则。《湘君》意在自愉,《学衡》存心救世”(《吴芳吉集》545)。也就是说,两本刊物在风格、内容与目的上均有不同。《湘君》第三期所载之《湘君简章》云:

本刊以陶写性情、注重文艺趣味,藉以相互观摩砥砺为宗旨。本刊以设在湖南,定名曰《湘君》。本刊出版暂不定期。本刊内容,不预分类别。惟绝对拒收谩骂、标榜及一切偏激之著作。本刊系由同人自由组织,言论概归各人负责,与所在之团体或学校无关。本刊材料,除由同人撰集之外,有与本刊宗旨相合之投稿,无论文言白话、新旧体裁,俱所欢迎。但立言措辞以雅正明洁为主。(“湘君简章”)

与《学衡》简章相比,其差异一目了然:《湘君》以“以陶写性情、注重文艺趣味,藉以相互观摩砥砺为宗旨”(“湘君简章”),《学衡》则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简章”)为旨归。题旨既然有异,风格与内容也就各有偏重了。吴宓曾说:“以《湘君》与《学衡》比较,各有所长。约而言之,《湘君》主创造,《学衡》主批评(兹所谓主者,乃材料偏重较多之意);《湘君》重文艺,《学衡》重学术;《湘君》以情胜,《学衡》以理胜”(《吴宓书信集》82)。

较之专收“文言”作品的《学衡》而言,《湘君》兼收“文言”与“白话”作品,也是一个特点。

《湘君》第一期所载吴芳吉之《吾人眼中的新旧文学观》,可以代表刘永济等《湘君》主事者对文学之新旧的看法。“吾人之于新旧,向来无所偏袒”(《吴芳吉集》430)。“真正之文学乃存立于新旧之外,以新旧之见论文学者非妄即讹也”(《吴芳吉集》433)。他认为:“文学之中,则无文言与白话之别。既为文学,则选用文字,一必要明净,二必要畅达,三必要正确,四必要适当,五必要经济,六必要普通。欲定文学形式之死活,必要合此标准”(《吴芳吉集》434)。刘永济也在《论文学中相反相成之义》一文中说:“所谓新旧文家之弊亦有二:(一)旧者之弊,在蹈袭古人之思想情感,而以矫揉字句篇章为锻炼。(二)新者之弊,在蹈袭西人之字句篇章,而以矫揉思想情感为新奇”(“论文学中相反相成之义”462),因而倡导“诗无新旧,惟其是”(“旧诗话”463)。《湘君》第二期之《上期报告》也重申了《湘君》诸公对于新旧的看法:“吾国文学之败乱,其祸首不在旧派之泥古难通,乃在新派之矫枉过正,既失中道,反昧大体故也。新派所攻击者旧派,吾人则于旧派新派之行,皆不直之。且吾人不特欲为文艺致观摩,且欲为道德负责任,此《湘君》之本面目也”(《刘永济先生年谱》273)。《湘君》努力以中道自持,讲求一种不激不随的内容风格,反对的是“伪新文学”,而不是所有的新文学。

与“志在救世”的梅光迪、吴宓不同,湘君社诸人有着强烈的“自愉”情结。对于这种“自愉”情结,《湘君》主事者不吝反复申说:

本刊内部,毫无组织,所行一轨,皆属同志,不用介绍加入,取群而不党之意也。本刊创设初意,只在同志之联络,不在与人为竞争。是以《湘君》中人,年龄程度,至为不齐。所为诗文,亦随人而异其得失美丑。然并得失美丑之作,竟以刊之者,年龄程度虽至不齐,而热心文艺,尊崇道德之思,一也。以言学问,彼此固是空无,纵有半解一知,要属身外之事,何与于我。意气相感,不能无已于言耳。安用较长论短,与世奔赴为欤?(《刘永济先生年谱》273)

本刊只在刊印同志之诗文著述,藉为道义精神之观摩,并非具体成立之社

会。故无老幼男女、省界国界、学校职业种种之限定,亦无介绍入社或征示会员之事。(《吴芳吉集》445)

慨自狂潮泛滥中土,所当者陋,所过者溺,《湘君》微弱,何足以言救济。《湘君》之必始终失败,理也势也!惟然,明知其必失败,自甘行行失败之中,无尤无怨,无畏无疑,坦然以进,孑然以止,此即《湘君》所望我同人者也。(《刘永济先生年谱》272—73)

无论是不愿“与人为竞争”“较长论短,与世奔赴”的态度,还是“自甘行行失败之中,无尤无怨,无畏无疑,坦然以进,孑然以止”的作派,都是湘君社“自愉”心态的产物。既然“意在自愉”,湘君社也就不需要明确的组织架构与入社程序了。

从发生在与《湘君》有关的一件纠纷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清高自持的心态以及《湘君》诸人的处事风格。吴芳吉曾在《湘君》第一期未经吴宓允许刊载了他的《旅美日记》。因事涉隐私,为吴宓惹来了许多“讥笑唾骂”(《吴宓书信集》86)。为此,吴宓致信吴芳吉,要求刊登启事加以说明。对此,《湘君》第二期在《上期报告》中作出了这样的解释:“上期选载吴宓君之《旅美日记》,中有非难自由结婚之语,不悦于上海某报,为所辱骂,此又《湘君》所深歉也。虽然,吾肯低首下心以与此辈辩哉”(《刘永济先生年谱》272)。不肯“低首下心以与此辈辩”,这种孤高自许的名士情调,大不同于一定要与新文化人辩个明白、争个高下的《学衡》。

这种孤高自许的名士情调,在刘永济身上体现得尤为分明。“诵帚教于长沙,时北大方鹭革新,举世趋之,诵帚若无睹也。数年,东南倡言笃旧,举世又复趋之,诵帚若无闻也。人问其故,曰:吾惟统计兼筹,凡吾诸生所应有于文学者,若干知识,若干能力,若干训练,而尽与之。其欲专于文也,即此而有门径,其不专于文也,即此可奠基础。若新若旧,非所言于青年辈也。故诵帚之门,长年如春风皎日,潮流不能荡也,风气不能移也。凡从诵帚游者,皆自得无烦闷”(“三论吾人”24)。刘永济号诵帚,“当举世狂呼打倒孔家店,打倒中国旧文化之日”,他的这种“自得无烦闷”的名士情调,与“南高诸人独奋起伸吭与之辩难”(“大学之

魂”154)的斗士姿态是迥异的。“南高诸人”致力于影响社会舆论,而刘永济等则对社会舆论不甚介意,“虽千万人吾往矣!”不屑于与新文化人争一日之短长,而宁可二三友朋相互切磋,自得其乐地从事“文艺”创造,以寄望于将来,这便是湘君社的风格,这便是刘永济的风格。

四、湘君社的文学活动与刘永济的辞章家风范

如果我们对《湘君》社的“自愉”心态有所了解,也就容易理解刘永济等人不愿与《学衡》合并的态度了。《湘君》创社以后,吴宓曾不只一次提出过合为一体的动议。他在写给吴芳吉的信中说:“苟弟及二兄能以文稿诗篇等多多寄示,或自撰或代收,则《学衡》亦即《湘君》,固二而一者也。今乃另起炉灶,别树一帜,徒费双方之心血时力”(《吴宓书信集》91),“苟能就此间已成之局,以《湘君》并入《学衡》,同心戮力,结为一体,凡《学衡》有须改良之处,弟及二兄,尽可详明揭示,宓当竭力推行,而《湘君》之白话歌谣等,不甚合《学衡》旧例者,固新派诸报所欢迎,岂患无发表之地哉!故以《湘君》合于《学衡》一层,实宓所认为最善之办法、最大之计划,而敢斗胆请于弟及二刘兄者也。[……]即黄叔巍、汤锡予诸兄,均谓早应如此。所以渴望弟及二刘兄离湘外出者,即望合为一团体,而不独树《湘君》之一帜也”(按,吴宓信中“二兄”“二刘兄”,指刘永济、刘朴)(《吴宓书信集》91)。对于“吴宓等函劝《湘君》与《学衡》合并”之议,湘君社诸人并不热心。《湘君》对于刘永济、吴芳吉等人的意义,首先是“游于艺”的所在,一个令之“精神甚安”(《吴芳吉集》547)的艺苑。他们所更为热衷的,是围绕着湘君社所展开的一些文学活动以及因这些活动而促发的诗词写作和文学研究。

湘君社是为了纪念屈原而成立的。吴芳吉曾作《湘居》诗,其注有云:“明德学校在长沙之西园,园中湖亭曰楚辞,刘弘度君倡建,以纪念屈子也”(《吴芳吉集》263)。《自订年表》亦载:楚辞亭于民国十二年二月倡建,“临澧辛树帜采楚辞中所有草木,环植四岸,以纪念屈子,并为明德廿周年祝也”(《吴芳吉集》546)。“刘弘度永济、刘朴君柏荣,与吾创湘君社,出杂志以矫正伪新派文学之失,所刊屈子画像,徐桢立君绘,争为京沪人

士影印”(《吴芳吉集》264)。1923年3月29日, 时逢明德建校20周年大会, 由刘永济发起倡建, 明德教员捐资, 在校内屈子湖中央兴建楚辞亭。亭刻王闿运联: “十步之内芳草, 六经以外文章”(“胡子靖先生年谱”431)。刘永济亲书屈原《离骚》全文, 悬于亭中。为此, 刘永济还填有《木兰花慢·楚辞亭》词一首:

对幽兰泪眼, 似曾见, 独吟情。自赋笔沉玄, 香簫约采, 寥落湘灵。蜺旌定, 怀故宇, 驾玉鸾欲下雨冥冥。鼓枻高歌去远, 凭阑春水方生。孤亭, 载酒同登。声艳楚, 俗传荆。怅苍茫今古, 芳菲总付, 横木荒城。遗馨, 尽堪揽结, 且不须醒醉问浮名。花外纷纷落照, 乱山何处归程。(“木兰花慢·楚辞亭”17)

该词于1924年5月发表于《湘君》第三期。刘永济在《湘君》第三期发表论文《迂阔之言》上下篇时, 署名为“楚辞亭客”。从这一署名, 也可知“楚辞亭”或者说屈原对于刘永济等湘君社同人的特殊意义。就连湘君社端午“雅集”、筹款活动, 议程中也包括“主席刘弘度所书离骚经一卷”(《刘永济先生年谱》284), 各赠曾广钧、胡子靖、徐绍周、李剑农等文友宾朋一项, 显示了以屈原传人自许的风范。

《湘君》每期出版, 例有聚会, 其性质与古代的文人社集相同。曹丕《与吴质书》尝云: “昔日游处, 行则连舆, 止则接席, 何曾须臾相失, 每至觴酌流行, 丝竹并奏, 酒酣耳热, 仰而赋诗, 当此之时, 忽然不自知乐也”(《曹丕集校注》258)。这里所描写的当即诗酒雅聚的生活。后代文士, 在诗酒雅聚的基础上组织诗社文社, 一方面表示趣味相投, 友情深厚, 另一方面是为了切磋琢磨, 促进创作。唐代的洛阳九老会(白居易所创), 宋代的彭城诗社(贺铸所创)、豫章诗社(徐俯所创), 元代的山阴诗社、武林诗社, 都属于文学社团。湘君社也属于这种文学社团, 其雅集旨在增强社团的活力并推进创作。“湘中文学之盛, 在近代中国实推第一”(《吴芳吉集》668), 湘君社的许多风雅而富文学情趣的活动, 如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月一日, “同人举行游山之会”, “渡湘江”而“登岳麓”(《吴芳吉集》678), 即是这种文学风尚

的延续。

湘君社诸人也看重因这些活动而促发的诗词写作和文学研究。以刘永济为例, 此时对词的兴趣日渐浓厚。他“少年时期曾在其姑父松琴龙家中得读古今词集, 这对他词学基础的奠定和兴趣的培养, 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刘永济先生的词学研究”7)。③1912至1917年客居上海期间, 刘永济的四哥刘永溟在上海做官, 晚清词坛的两位著名词人, 朱祖谋和况周颐, 碰巧也寓居上海。刘永济以一首《浣溪沙》(几日东风上柳枝)向况周颐请益, 况周颐大为赏识, 说: “能道‘沉思’一语, 可以作词矣!”朱祖谋也赞许刘永济“能用方笔”。所谓“能用方笔”, 是说刘永济有作词的天分。刘永济《词论》卷下《结构第五》引《蕙风词话》卷一曰:

词不嫌方。能圆, 见学力; 能方, 见天分。但须一落笔圆, 通首皆圆; 一落笔方, 通首皆方。圆中不见方, 易; 方中不见圆, 难。(90)

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 被两位词坛老宿誉为作词得法, 且有作词的天赋, 这对刘永济来说, 真有一种登龙门的感觉。他终身以况、朱传人自勉, 致力于弘扬常州词学, 即因他曾得到过况、朱的认可。而身为《湘君》主事者的刘永济, 在弘扬常州词学的同时, 也持续地显示了他作为一个词人的风采。他后来的武汉大学同事苏雪林教授, 常语含讥讽地称他为“旧式文人”, 其实恰切地道出了新文化人对刘永济的定位。宁可被视为“旧式文人”, 也依然以“词是吾家事”自许, 这里显示的正是浓郁的辞章家气质。

刘永济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 集中体现为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文学论》。《文学论》一书, 是以“文学概论”讲义为基础补订而成。“在明德中学时, 他给学生讲授文学概论, 贯通中西, 要言不烦, 所成讲义, 取名《文学论》, 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重印多次”(“刘永济先生的词学研究”5)。《文学论》是刘永济最早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 也是20世纪初叶较早问世而又较有影响的现代意义的文学理论著述。

刘永济《文学论》认为, 文学之所以能够成立, 在于它有科学、哲学所不能取代的功能, “总

而言之,哲学科学皆学识之事。文学家不可无学识,已甚明白。特哲学家所得之学识,以之为解释自然之用;科学家所得之学识,以之为实验自然之用;文学家所得之学识,以之为阐演自然之用”(12),“文学家有学识然后有了悟与判断之能力。有了悟判断之能力,则对于人情物态,始能见到精微之处。能见到精微之处,又能综合而表曝之,则能使人于其所表曝之中,收感乐与慰苦之效。能收感乐与慰苦之效,则能感化人之情性,使之高尚优美。文学至于此境,已极艺术之能事矣”(13)。刘永济将文学作品分为学识之文和感化之文两类,而以感化之文为主。所谓感化之文,即诗歌、戏曲、小说、散文等。刘永济对文学的界定,与新文化人的理念并无多少不同。盖刘永济意中的“辞章”,与新文化人说的“文学”,其间重合面甚大。

刘永济《文学论》对中国文学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哲学以善为本,中国文学亦以善为本。主善的文学,其长处在于切近人生,温柔敦厚,其短处在于不随世变,情趣缺乏,“故真与善者,文学家之学识也。具此学识不欲正言质言以强聒于人,而以巧妙之法,用文字感化人。不欲空言抽象之理于人,而以具体的表现,使人自领悟。故文学家不可无道德与智慧,而纯正文学非质言道德与智慧之事也”(80),“我国文学,因历代尊经之故,多以善为根本,不免偏重事理而少情趣。扬雄壮年,悔其少作为雕虫小技,而摹《易》以作《太玄》,摹《论语》以作《法言》,摹《尔雅》以作《方言》,后世昌黎韩愈遂比之于荀孟。他如真西山选《文章正宗》,尤重道德,谓‘立言必关世教’。程子论文,直以为文为玩物。盖其时理学盛倡,文学亦受其影响,又于学识文学与感化文学二者辨之未明,故诗歌亦以之为议事说理之用,虽意在侧重人生,而有伤艺术矣”(81)。以诗词写作和辞章研究为毕生事业的刘永济,其总体文化立场虽与新儒家一致,却又有其微妙的差异:新儒家往往轻视辞章,轻视感化文学,刘永济则对感化文学情有独钟。“在刘先生已完成的学术著作中,以‘楚辞学’‘龙学’和词学方面的较多,学林也很自然地推崇先生在这些领域的造诣,然实际上刘先生治学之广,读书之多,是很惊人的。他在群经、诸子、小学、史学及佛学方面,在目录、校勘、版本方面,在地理沿革、名物制度等方面,修养都很深厚。所以他研治

古籍,就能左右逢源,多所创获。从有关《楚辞》的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生对古文字学和古史的造诣;从有关《文心雕龙》等著作中,又可以看出先生对玄学,特别是《庄子》的造诣;而从其诗词的创作与研究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先生对禅学的研究也是很深的。他所以很少发表文学研究以外的东西,只不过是说他并不认为读了书就一定要让别人知道罢了”(“刘永济先生的词学研究”6—7)。也许可以补充一句,刘永济之所以很少写文学研究以外的作品,还是因为他更富于辞章家的气质,刘永济更乐于以辞章写作和辞章研究来呈现他的文化理念。

刘永济终生以集部研究为主,小说戏曲非其关注中心,但《文学论》对小说戏曲并不忽视。他认为,文学的功能既然主要是“感化情性”,其功能发挥得越充分,自然也就越有价值。“至于表现之时,或以诗歌,或以散文,或以戏曲,或以小说,皆其采用之方法有异。至其感化情性,则一也。但诗歌、戏曲、小说、散文之中,其功能亦各有大小。大抵戏曲、小说感化之功能,较诗歌、散文更为普遍”(14)。刘永济认为,就文体的理想形态而言,作为感化文学的戏曲、小说,胜于诗歌、散文;但就实际的创作而言,中国古代小说的成就不如戏曲,不如诗词。

刘永济《文学论》的上述基本判断,与其辞章家风范构成了一种呼应关系。

结 语

由于《湘君》存在的时间有限,影响力无法与志在“救世”的《学衡》相提并论,关于它的研究、评论甚少,可资利用的直接史料极为有限。但目前所见的这些言论、史料,已足以支撑这样的结论:《湘君》与《学衡》之间确实存在着“同声应气”的关系。正是这样一层亲密关系,使我们对尚未进入大学场域、远离核心学术圈子的刘永济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基本立场,有了明确的认知。但《湘君》与《学衡》亦存在鲜明的差异。《湘君》的“文艺趣味”、兼容文白,尤其是其主事诸公的自愉心态和名士情调,与《学衡》的偏重学术、独重文言,尤其是其主事诸公的斗士心态和狂者风范,差异之显著,一目了然。正是这种差异,赋予了对《湘君》作独立考察的价值。

刘永济在《湘君》与《学衡》中扮演的角色大为不同。如果说,学衡派中的刘永济,更多扮演支持者、追随者的角色,湘君社里的刘永济,则以主事者的身份,更多地发挥了导向功能,并常以辞章家的风范领袖群伦。刘永济以辞章研究和诗词写作作为安身立命之地,其人生路径在《湘君》时期就已彰显于世。

注释[Notes]

- ① 按《刘永济先生年谱》1922 年载:“5 月,经梅光迪、吴宓介绍,为《学衡》杂志社撰文,无稿费,但非《学衡》社员。”参见:刘永济:《诵帚词集云巢诗存 附年谱 传略》,载《刘永济先生年谱》,徐正榜、李中华、罗立乾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270 页。
- ② 按吴宓多次向刘永济、吴芳吉等人催稿。如 1923 年 4 月 6 日写给吴芳吉的书信中谓“宏度兄之词,已尽登,乞速续寄”。参见吴宓:“致吴芳吉(七)”,载《吴宓书信集》,吴学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第 92 页。
- ③ “松琴龙”即粤西词家龙继栋(1845 年—1900 年),字松岑,一字松琴,号槐庐,广西临桂人,清道光年间状元龙启瑞之子,著有《槐庐词学》。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学衡派评介”,《民国思想文丛·学衡派》,李帆主编。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 年。1-22。
- [“A Review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Xueheng School.” *The Collection of the Academic Circle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Xueheng School*. Eds. Li Fan, et al. Changchun: Changchun Press, 2013. 1-22.]
- “学衡简介”,《湘君》3(1924): 175。
-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Xueheng.” *Xiangjun* 3 (1924): 175.]
- 曹丕:《曹丕集校注》,魏宏灿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年。
- [Cao, Pi. *The Annotated Complete Works of Cao Pi*. Ed. Wei Hongcan. Hefei: Anhui University Press, 2009.]
- 程千帆:“劳生志略”,《程千帆全集》第 15 卷,张伯伟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1-60。
- [Cheng, Qianfan. “Memories of Life.”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eng Qianfan*. Vol. 15. Ed. Zhang Bowei.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0. 1-60.]
- 程千帆 巩本栋:“刘永济先生的词学研究”,《古典文献研究》第五辑,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年。1-26。
- [Cheng, Qianfan, and Gong Bendong. “Liu Yongji’s Study

of Ci Poetry.” *Class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Vol. 5. Nanjing: Jiangsu Ancient Book Publishing House, 2002. 1-26.]

“湘君简章”,《湘君》3(1924): 224。

[“General Rules of Xiangjun.” *Xiangjun* 3(1924): 224.]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1(1922): 1。

[“General Rules of Xueheng.” *Xueheng* 1(1922): 1.]

郭斌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二十周年纪念之意义”,《大学之魂:南京大学精神传统文存》,洪银兴、陈骏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76-79。

[Guo, Bingh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wenty Anniversary of Nanjing Higher Normal School.” *The Soul of University: The Corpus about the Spiritual Tradition of Nanjing University*. Eds. Hong Yinxing and Chen Jun.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76-79.]

“胡子靖先生年谱”,《百年明德 磨血育人》,长沙明德中学百年校庆办编。长沙:明德中学,2003 年。418-38。

[“Hu Zijing’s Chronicle.” *The One Hundred Year History of the Mingde Middle School*. Ed. The Centennial Office of the Mingde Middle School. Changsha: Mingde Middle School, 2003. 418-38.]

华麓农:“吴雨僧先生遗事”,《回忆吴宓先生》,黄世坦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57-60。

[Hua, Lu’nong. “A Supplementary Record of Mr. Wu Yuseng’s Deeds.” *In Memory of Mr. Wu Mi*. Ed. Huang Shitan. Xi’an: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0. 57-60.]

李绍平:“张舜徽先生与近代湘贤的交谊”,《张舜徽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周国林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153-62。

[Li, Shaoping. “Mr. Zhang Shunhui’s Association and Friendship with Modern Hunan Celebritie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Zhang Shunhui’s One Hundred Year Old Birthday*. Ed. Zhou Guolin.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1. 153-62.]

刘永济:“鹧鸪天”,《诵帚词集 云巢诗存 附年谱 传略》。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56。

[Liu, Yongji. “Partridge Sky.” *The Collection of the Liu Yongji’s Ci Poetry; The Collection of the Liu Yongji’s Poetry; Mr. Liu Yongji’s Chronicle; Mr. Liu Yongji’s Biograph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56.]

——:“木兰花慢·楚辞亭”,《诵帚词集 云巢诗存 附年谱 传略》。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17。

[——. “Slow Tune of the Magnolia The Pavilion with the

- Theme of the Songs of Chu.” *The Collection of the Liu Yongji’s Ci Poetry; The Collection of the Liu Yongji’s Poetry; Mr. Liu Yongji’s Chronicle; Mr. Liu Yongji’s Biograph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17.]
- :“文鉴篇”,《文学论 默识录》附《论文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434-40。
- [---. “The Discussion on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Article.” *The Literary Theory; The Silent Record; Uncollected Essay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434-40.]
- :《词论 宋词声律探源大纲》。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 [---. *The Theory about the Ci Poetry; The Outline of the Source of The Ci Poetry’s Rhythm of the So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 :《文学论 默识录》。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 [---. *The Literary Theory; The Silent Record*.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 :“论文学中相反相成之义”,《文学论 默识录》附《论文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451-62。
- [---.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Truth of the Both Opposite and Complementary in Literature.” *The Theory about the Ci Poetry; The Outline of the Source of the Ci Poetry’s Rhythm of the So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451-62.]
- :“旧诗话”,《文学论 默识录》附《论文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463-75。
- [---. “The old-style poetry talks.” *The Literary Theory; The Silent Record; Uncollected Essay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463-75.]
- 鲁迅:“一是之学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392-95。
- [Lu, Xun. “The Theory of Uniform Standards.”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1.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392-95.]
- “上期报告”,《湘君》3(1924): 169-71。
- [“Report of Last Issue.” *Xiangjun* 3(1924): 169-71.]
- 沈卫威:《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 [Shen, Weiwei. *The Review of the Xueheng School: the Modern Fate of Cultural Conservatism*.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9.]
- :《“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
- [---. *The Genealogy of Xueheng School: History and Narrative*. Nanchang: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7.]
- 吴芳吉:《吴芳吉集》,贺远明、吴汉骥、李坤栋选编。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
- [Wu, Fang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Wu Fangji*. Eds. He Hanming, Wu Hanxiang, and Li Kundong. Chengdu: Bashu Publishing House, 1994.]
- :“三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湘君》3(1924): 1-25。
- [---. “The Third Discussions on the New and Old Literature Ideas in Our Eyes.” *Xiangjun* 3(1924): 1-25.]
- 吴宓:《吴宓日记 1917—1924》,吴学昭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 [Wu, Mi. *Wu Mi’s Diary 1917—1924*. Ed. Wu Xuezhao.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 :《吴宓日记续编 1961-1962》,吴学昭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 [---. *The Continuation of Wu Mi’s Diary 1961-1962*. Ed. Wu Xuezhao.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 :《吴宓书信集》,吴学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 [---. *Letters of Wu Mi*. Ed. Wu Xuezhao.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 :《吴宓自编年谱: 1894-1925》,吴学昭整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 [---. *Wu Mi’s Self-compiled Life Chronicle: 1894-1925*. Ed. Wu Xuezhao.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 :“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中华新报》增刊 1922 年 10 月 10 日。
- [---. “Reaction to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China’s New Newspaper* 10 October, 1922.]
- 徐正榜 李中华 罗立乾编:《刘永济先生年谱》,《诵帚词集 云巢诗存 附年谱 传略》。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247-618。
- [Xu, Zhengbang, Li Zhonghua, and Luo Liqian, eds. “Mr. Liu Yongji’s Chronicle.” *The Collection of the Liu Yongji’s Ci Poetry; The Collection of the Liu Yongji’s Poetry; Mr. Liu Yongji’s Chronicle; Mr. Liu Yongji’s Biograph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247-618.]

(责任编辑:程华平)